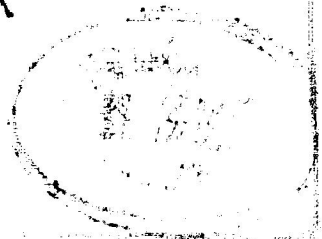


乱弹诗弦

今诗沃野

• 5 •

刊



今 诗 话 丛 书

乱弹诗弦

公 刘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苑兴华

封面设计：叶雨、马少展

今诗话丛书

乱弹诗弦

LUANTAN SHIXIAN

公 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 67,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0002·77 定价 1.10 元

目 录

自序	1
生活、诗意及其他	4
心灵的交流	26
——在第十九届贝尔格莱德 国际作家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新诗的一些基本观点	34
答伍夫楹同志	62
关于诗的品格	66
《白色花》学习笔记	80
附录一：耿庸同志来函	107
附录二：罗洛同志来函	108
《九叶集》的启示	110
不是第三条道路	142

自序

有几篇文章，似乎有必要饶舌一番。

《心灵的交流》是在南斯拉夫一次国际集会上由我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发言的底稿。篇幅要短，上下古今还不能遗漏，同时要突出重点，让那些对中国诗歌知之甚少或者毫无了解的外国朋友听了有所得，这是相当不好完成的任务。兼之我是生平第一次去外国参加外事活动，而且病后有点口吃，主观条件就更不利了，这对我的确是个考验。我现在还能记得，自己站在麦克风前，由几种语言同声传译的情景。那是十分激动人心的场面。所幸我还沉着，因为，我从中国的诗歌中汲取了力量，获得了信心，既然中国诗歌和中国诗人和我同在，我就什么也不害怕了。

《关于新诗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应《文学评论》编辑部长途电话约稿而写的。由于他们空着版面

等候，写得相当匆忙，肯定会有不够深思熟虑的地方——尽管国内不少内部刊物把它翻印成为参考资料。我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也有少数人提出了个别不同意见来和我商榷，我想，这是正常现象，我从中也能学到不少东西。《诗探索》编辑部转来的伍夫楹同志的信，就是这样的例子。我身体多病，不能一一作复，借此机会，请求所有因此文而给我写过信的同志们谅解。

谈《白色花》和《九叶集》的两篇读书札记，以及《不是第三条道路》，发表以后，相继引起了颇为热烈的反响，这使我很高兴，它说明关心我们的新诗运动者还是大有人在。当然，三篇文章都不过是个人的心得和理解，只是“一家之言”，既可以共鸣，也不妨争鸣的。老实讲，更能打动我的心弦的，倒并不是评论界的而是普通人的反应。我总认为，最有发言权的是生活在诗里的群众。他们是诗的主人。

我恳切地期待着更多人的指教。

二

这是我的第三个诗论集。第一个是《诗路跋

涉》(江西版),第二个是《诗与诚实》(花城版)。

写诗难,写诗论不说尤其难,至少同样难。写诗论要求作者不但必须是诗的行家,能深切体会到创作的甘苦,而且同样必须坚持说真话。

当然,真诚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不过,我想,老老实实的犯错误总比虚伪矫饰窃取“正确”来得光明磊落。

说真话,往往会得罪人,而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个不遗余力地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社会里,它依旧是一堵随处可见的令人生畏的高墙。

不过,我还是自讨苦吃地这样做了;我觉得,唯有如此,方能无愧于心,否则,干脆封笔得了。

也有不少同志在热心地支持我,鼓励我,包括三联书店的领导和编辑,我感激这些同志们,没有他们,这个小册子恐怕是难以出世的。

1984.8.11

第五只“秋老虎”肆虐之日,

挥汗写于合肥

生活、诗意及其他

谈不上讲课，朋友们聊天吧。既然是聊天，就不一定有中心，如果硬要归纳，只能笼统地说，我想谈四个“一定不要”和四个“一定要”。

第一点常识是，一定不要拒绝生活，但一定要提炼主题。

创作，顾名思义，是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的劳动。它从无到有，原来世界上没有这个作品，现在有了，这叫创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创作又毕竟是生活的复制品，虽然是经过筛选、加工和升华的精致的高级复制品，所以，又不是无中生有。一方面是从无到有，一方面又不是无中生有，岂不矛盾？不，不矛盾，这一现象，恰恰揭示了生活与创作二者之间真实的合乎规律的渊源关系。而摆正这一关系，又从根本上决定了文艺工作的性质：它是个体精神劳动，然而它反映的却是群体物质活动，借用摄影家的术语，就是：它用书面的形式

给社会众生相显影和定影。由于是个体精神劳动，就不能不具有区别于别的物质生产劳动的特殊性，而由于说到底又是社会提供了创作素材和诱发了创作冲动，就不能不承认，一切作品的第一个作者是时代，是群众；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创作有它的特殊性，但不应该有什么神秘性，更不可据此而产生什么超越一切之上的自以为了不起的优越感。

人贵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都能从这点认识出发，就能比较正确地对待自己和比较正确地对待群众，就有了进行深入探讨的前提。

我们说的生活，当然是指社会生活，而不是指某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你的内心生活再丰富，也比不上由千万个不同出身、不同教养、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志趣、不同气质、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面貌……的人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丰富。这样的社会生活，简直象海洋一样浩瀚，深邃，象万花筒一样光怪陆离，瞬息万变，要完全熟悉它和全部把握它是不可能的，可是，熟悉它的某一部分和把握它的某一部分却是可能的。问题是需要做有心人，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是不是可以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在生活的积累上，我们倒不妨

学习守财奴，象守财奴捏紧一枚一枚硬币攒钱似的，记住一个一个细节，充实我们生活的宝库。一九五五年，文艺界批判过以胡风同志为首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一个观点受到了特别严厉的口诛笔伐，表达这个观点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说：生活就在你的周围，起点就在你的脚下。如今我想，假如剔除掉它本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或者包涵有的知识分子小圈子意识，同时也剔除掉对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的误解，这个口号用在今天变化了的主客观情势之下，未必就有什么错误。难道不对么？你是一位工人的话，理所当然地你要先熟悉你的那个小组，扩大一点，你的那个车间，只要办得到，再扩大一点，你的那条作业线，那个工厂。有雄心壮志的，还一直扩大到人家的家庭和社会领域中去，了解一下他们周围都活动着一些什么样的亲属和什么样的朋友。所谓周围，乃是一个可以无限开拓的空间，所谓脚下，自然会有一直向前走下去的意思，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座的同志，大部分都具备一个好条件，你们本来就是工农兵，你们不必象专业作家那样，要提倡“下去”；你们还能下到哪里去？本来就在下边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劝你们认清和发挥

这个优势。当然，也有在生活之中，却感到没有什么可写，身在宝山不识宝的，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通过另外的途径去解决。

一个热爱文艺的人，我以为，必须始终象孩子一般天真好奇，打破砂锅问到底，又必须始终象哲学家一样深思熟虑，不轻易接受现成的结论；要经常保持旺盛的求知欲，要经常保持庄严的历史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总纲》一文中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请注意，他说的是一切，而不是一些。高尔基提出过文学是人学的光辉命题。这些话都是真理，它督促我们，应当认识人，了解人；人是各种各样的，因此要认识、了解社会生活的矛盾性和同一性，你认识、了解得越透彻，越准确，你的作品就越有独创性，越有份量。

我们强调不要拒绝生活，就意味着既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也要注意凡人小事、身边琐事，包括一声感叹，一个手势，一种表情，都不要让它们遗漏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之外。只有把这一种关心和这一种注意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宏观的东西和微观的东西结合起来，才有资格说一声：我进入了创作准备。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观察别人的同时，不要忽略了解剖自己。换句话说，

自己，就是第一个需要熟悉，需要了解的对象；我们讲心灵美，讲忘我精神，这是对的，不过，如果忘我到忘记解剖自己的程度，那就不但不是对的，而且是危险的了。

主题来自生活。什么是主题？来这儿讲课的南京的和上海的教授们、专家们会教给你们以定义的，而且恐怕还不止一种定义。顺便申明一下，我今天的发言，包括我对主题的理解，很多都不大符合中文系的课本，不那么正统，不那么正规，很可能是谬论，请大家先姑妄听之，然后再加以鉴别和裁判。

我认为，你在生活中发现了值得写也需要写的东西，你感到那个东西有一点意思，会引起大家的关心和兴趣，这一点意思就是主题。质言之，主题就是中心思想。不过，你感到有意思，也许别人感到没有意思，你感到有这样的意思，他却感到有那样的意思，这种现象并不奇怪，立场、观点不同嘛。此外，一个作者思想境界的高下，往往会影响到主题开掘的深浅。

怎么表现你的主题？不外乎三种办法：第一种是开门见山，第一段，甚至第一句就破题；第二种是“譬如北辰，众星拱之”，许多星星和一个北斗

星座并存在天上，都闪闪发光，但是最吸引你的视线的是北斗星座，而且，你会得到这么一个印象：仿佛那许多星星，正是为了衬托北斗星座才显示自己；第三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相当巧妙的手法，是高难度动作，它叫你隐约感觉得到，却无法一下子就抓住，这就要求你好好寻思一番，不可能“得来全不费工夫”。屈原的《楚辞》中有一些篇章，到底在说什么，两千二百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论。

在文学创作中，急功好利是近视眼，要碰钉子的；素材和作品的关系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关系。要求立竿见影，搞宣传品可以，搞文学不行。主题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倒象是化学元素中的不同分子，虽然广泛地存在着，活跃着，但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聚合和化合，才能形成一根链条，形成一种结构。又好比酿酒，粮食经过触媒（在酒是酒曲，在创作则是形象、动作、语言、事件、暗示等等）充分发酵了，然后自然而然地分泌出酒精。粮食的一部分变成了酒，剩下一部分是酒糟。在这里，酒精与粮食相当于主题与生活，酒与粮食则相当于作品与生活；作品里面有主题，酒里面有酒精。

为了更具体地论证这个提炼的过程，分泌和

榨取的过程，我举我自己的一首诗为例略加说明。——不是因为它写得怎么好，而是谈起来切实，随便——我写过一首《读罗中立同志的油画〈父亲〉》，发表在《诗刊》上。怎么写出来的？“酒曲”当然是那幅画，“粮食”就是我的长时期的农村生活。我不是以工作队员、干部的身份，而是以与农民一样，甚至比农民还要卑贱的身份去感受周围的一切的。我仔细观察农民，农民也仔细观察我，后来他们得出了与“上边”不同的结论：这个人是好人，不是坏人，因此，他们把自己的心掏给了我，什么都对我说，毫无戒备。这样，我就不仅能看到他们的外貌，而且知道他们的内心，不仅能看到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言谈举止，而且知道他们没有表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我敢毫不夸口地说，有了那些年的生活，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理解中国农民的命运了。我不是说只有处在我当时那种情况，采取我当时那种方式，才能懂得生活；付出那样的代价去了解生活是不正常的。不过，有人宣布，只要平等待人就行，这未免太轻松了。我说，平等待人固然要紧，但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心贴心，心换心；首先，我一定得做到同农民一样去感受生活，同时，我又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还应该用革命者的

眼光去展望生活。所以，一旦我看到了罗中立的画，我也就马上展开了我心中的画，看到了那位父亲的皱纹，就想起了不知多少农民的皱纹，看见那位父亲的汗珠，就想起了不知多少农民的汗珠，看见那位父亲的土碗，就想起了不知多少农民的土碗，看见画面上作为背景的一片金黄，就想起了理应拿到手、理应属于他而并未拿到手，并未属于他的多少个好年成！因此，我对那支夹在耳朵上的圆珠笔——后来，我听说这是一位领导同志出的点子，大概是所谓“亮色”吧——特别反感，我觉得，那个不值钱的玩艺儿纯粹是对九亿父老兄弟的污辱！于是，一出手我就抓住这支破坏了《父亲》形象的完整性的圆珠笔，提出了一连串的诘问，接下去我又选择了三组镜头概括了过去长时期祸害农村的左倾路线（编辑部非常谨慎，替我删去了一组，四行），最后，归结到目前，正在席卷中国农村的大改革和大转变，预报光明和富裕的来到。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这首诗的主题？我就要回答：中国农民的抗议、控诉和呼唤，就是它的主题。全诗不过几十行，说实话，它几乎调动了我的全部的有关生活储备。

第二点常识是，一定不要拒绝交朋友，但一定

要创造人物。

前面我主要讲了生活的重要性的和从生活中摄取主题的大致的路子，然而，一个人的生命有限，又受到地域、行当、见闻等种种制约，有些事更无法一一亲自体验，这就得另找新的源泉，弥补不足。有两股泉水是靠得住的，一股叫做广交朋友，一股叫做多读好书。读书留到以后再讲，这里先讲广交朋友，以及广交朋友与创造人物的密切关系。我在广交朋友这一点上，做得并不理想，主要的毛病出在广字上，不广。广了，自然难免杂一点，而我们这一辈过来人，怕的正是这个杂——怕政工干部说你社会关系复杂；其实，三教九流，引车卖浆，都应该来往。老舍先生能写出《茶馆》和《骆驼祥子》那样辉煌的作品，除了作家本人爱憎分明的政治倾向和文字功底外，对旧北京的市井人情和下层社会了如指掌，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保证作用的。同样，肖军同志如果仅有东北旧军队行伍生活的那一段亲身经历，而没有许许多多扛枪吃粮的朋友，也未必能写出《八月的乡村》这部名著。老舍先生和肖军同志都群众关系极好，“广结善缘”，没有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习气，不怕什么斯文扫地。假如我们也能做到这样，朋友多了，

可供选择、改制的生活原型自然也就多了，人物自然也就栩栩如生了。一个作者，当他把眼睛闭上，立刻看到许多形象在脑海中扑腾，那么，我们就应该向这位作者表示祝贺：“恭喜发财！”因为他的仓库里装满了活的财宝。

不错，有一句谚语，说是：“要了解一个人，先了解他交的朋友。”一般说来，这是人生智慧的总结。不过，我以为它不能机械地运用于作家，推而广之，也不完全适合于文艺作者乃至习作者。文艺作者的品性操守是一回事，他的社会交游又是一回事。和流氓、小痞子有点接触，就一定也会变成流氓、小痞子吗？不见得。我倒要奉劝有志者，放大胆子交几个流氓、小痞子之类的朋友，这是一桩大有益于创作的事。你不能总是写先进分子，写劳动模范，还得涉足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既然我们的社会中还有流氓和小痞子，那么，我们的文学艺术中就应该如实地描写他们，反映他们，描写和反映的目的在于改造他们，而不是学习他们。同样，官僚主义者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客观存在。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和官僚主义者以及他们制造的麻烦打交道，而这个官僚主义者和那个官僚主义者不同，这种麻烦和那种麻烦也不同，可是，我们作品里的